

代际差异与数字融入： 智媒时代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质性研究

赵红艳 王丹蕾

【摘要】满足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需求并支持其进行社会参与,是智媒时代积极老龄化的精髓与核心。由于特殊的生命历程,当代老年群体在智能媒体接触与使用方面呈现出独特的代际特征,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意愿与方式。文章通过质性研究发现:自我需求满足与数字获得感、同龄群体效应、重新角色定位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动因;在智能媒体可供条件下,老年人的经济和文化参与较为活跃,政治参与相对缺乏,部分老人在社区协助下尝试参与志愿活动;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根本在于建设适老型社会,通过社区和家庭两个平台增强代内联系和代际互动,从观念和行动两个层面提升老年人的数字获得感和社会融入感。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社会参与;代际差异;数字融入

【作者简介】赵红艳,女,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丹蕾,女,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哈尔滨 150086)。

【原文出处】《未来传播》(杭州),2023.5.33~4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城市退休老人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参与研究”(19BXW095)。

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生存状态和心理健康正引发社会的持续关注。2002年,联合国首次对“积极老龄化”做出正式定义:积极老龄化是个体在老年阶段最大限度发挥健康、参与、保障的基本权利效用的过程。^[1]这一理念提倡给予老年群体更多社会参与、社会创造的机会,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在手机等应用工具逐渐智能化的情境下,老年人利用先进技术来获取健康信息以及增加社会参与的诉求愈发强烈。^[2]他们通过技术赋权拥有了表达与分享的机会,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活感受和社交体验,增进了晚年生活幸福感。但同时受技术素养和接人鸿沟的影响,老年人在智媒时代的社会融入困境依然存在。

20世纪50年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开创代际社会学,关注微观个体生命历程与宏观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他提出“社会代”的概念,用以指代“因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同龄群体”。^[3]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典型的“社会代”群体,他们是社会主义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独特的生命历程使这一代老年人具备了与其他世代人群迥异的代际特征:他们勤俭、保守,拥有坚韧的意志和强劲的生命力。同时,青少年时期跌宕的社会经历又使他们对外在环境变化抱有敏锐的感受力和高度的风险规避意识。本文将在代际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下,分析当代老年群体面对数字化生活场景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偏好,为老年人借助智能媒体进行社会

参与提供理论支撑。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本文依据中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标准,将老年人的年龄范围界定为60周岁及以上。^[4]为保障研究过程的可操作性以及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本项目组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老年大学、社区、个人关系网等渠道招募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的选择标准为:①年龄在60岁及以上;②无明显的认知功能障碍;③能够熟练使用智能产品;④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社会调查。最终,本项目组确定63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a01、a02…a63)进行深度访谈,所在区域覆盖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3名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等社会统计学信息如表1所示。访谈采用面对面访谈与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内

表1 调查对象的社会统计学信息

项目		占比/%
性别	男	46.19
	女	53.81
年龄(岁)	60-69	50.29
	70-79	28.07
	80及以上	21.64
职业	退休	61.40
	企业员工	7.60
	事业单位	7.02
	务工	3.51
	务农	14.04
	其他	6.43
所处地区	黑龙江省	22.81
	吉林省	15.79
	辽宁省	5.85
	内蒙古自治区	4.68
	北京市	8.77
	河北省	4.68
	浙江省	7.02
	江苏省	5.85
	广东省	2.92
	云南省	9.36
	四川省	8.19
	重庆市	4.08

容主要涉及老人智能媒体使用情况、日常活动情况、家庭结构情况三大方面,包含15个具体问题。同时,为了揭示老年人在智媒时代社会参与中获得的社会性支持力量,使研究结论更为全面宏观,研究者又选择了部分老年调查对象儿女或孙辈共6人(b01-b06)以及所在社区的5名社区工作者(c01-c05)进行访谈,以上三部分原始资料构成本研究的基础数据。

二、智媒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动因及社会支持

(一)自我需求满足与数字获得感

作为老年社会理论体系中最广为接受的理论分支,社会活动理论认为社会活动是人们寻找生活意义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步入老年仍能参加社会活动,他不但会获得健康和社会福利,而且能通过塑造积极的自我形象获得更大的生活满足感。^[5]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大层次。访谈过程中谈及智能媒体的有用性感知问题时,老年受访对象大多肯定了智能媒体对其个人需求的满足作用,感知有用性较高。对于“为什么想要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这一动机性问题,21位老年受访对象给出了“搜索膳食搭配”“了解保健信息”“交流互动”以及“与社会不脱节”等回答。虽然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马斯洛所列的五种需求在不同老人身上的表现形式和满足状态各有不同,但这已经能够说明老年群体存在着主动利用智能产品进行社会参与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趋势。

研究还发现,对于相当大一部分老年人而言,高层次的情感需要和精神需要已经成为影响老年群体社会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开放的网络环境、零壁垒的技术准入标准、多元化的平台设置,使老年人重返社会舞台、实现自身价值具有了可能性。技术赋权下的老年群体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为自我实现提供了情感能量和价值前提。满足老年人最高层次自我实现的需求,为其提供在智媒时代数字获得感和持续性发展需求的实现途径,这是将老年群体的短期社会参与活动转化为积极主动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参与行为的关键。

除了自我需求的满足外,对社会资本获得的期待也是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主要推动力。社会资本

是一种基于信任和互惠的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支持和互惠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测量维度。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个体参与集体活动,进而获取资源和支持。数字化社交方式不仅能够促进老年人原有社会关系的维系,更有助于其融入新型数字化社群,网络主体间通过共享表达意义系统实现社会资源的转化。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社会交往理论中提出以沟通为取向的交往行为是合理行为,老年人的数字化社会参与是积极适应数字化表达以加大群体间理解、弥合群体间鸿沟的重要表现。

(二)集体主义惯性思维下的同龄群体效应

相比于70后、80后、90后和Z世代,当代老年群体在人生早期所接受的文化熏陶和价值观教育更为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整齐划一的模式给他们的性格刻上了结构性烙印,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这一代人独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并深刻影响着后续的行为倾向。^[6]相比于更为年轻的代群,当代老年群体社会性格中集体主义文化模式的色彩更为浓烈。他们更加渴望群体归属感,更加服从权威,也更加享受从属于某一个组织或者群体所带来的“被庇护感”。由此,社会诞生了一系列老年亚文化群体。

老年亚文化理论认为,老年人参与同龄群体的活动是重新融入社会的最好方式,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向老年阶段的过渡。同龄群体由于拥有类似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共同的社会经历而容易产生强烈的代际认同,在发展心理学领域被称为“同辈效应”。作为信息时代的边缘人群,老人们熟悉的生活经验被打破,抱团取暖的需求较之其他人群更为强烈,而那些和他们具有相似生活背景的同龄人会使老年人产生天然的亲近感。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为老年人寻找同龄群体提供了便利条件,老年人的同龄群体主要为同学、退休前的同事、亲戚朋友、邻里等,彼此之间具有高度、持续的互动,关系紧密,属于典型的强关系。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富勒(James Fowler)在《大连接》一书中指出:“强连接引发行为、弱连接传递信息。”^[7]同龄人群体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具有强有

力的影响,如访谈中老人所言,“之前参加社区的艺术团的时候我还是不太有信心的,毕竟之前也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有一次活动后,我们的表演视频被社区发到了他们的抖音号上,得到了很多点赞和评论,很多姐妹都发微信祝贺我,从那以后我就信心倍增,更喜欢参加这种活动了,心境也更开阔了。”(a02)老年亚文化群大多有现实强关系的根基,往往比那些仅仅依靠趣缘相关联的网络小圈子更为牢固。圈子结构更紧密,互动的深度、广度、频度更强,也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更长的生命期。因为熟悉彼此的兴趣爱好,成员们在群里分享旅游、摄影、购物、烹饪等各种信息,既增添了晚年生活的乐趣,又加深了老友间的感情,这种满足感会成为老人进行社会参与的持续性动力。

(三)“燃文化”模式下的重新角色定位

近两年,一种以颓丧为主要特质的文化倾向在青年群体中流行。佛系、躺平、摆烂等网络热词勾勒出当代年轻人情绪低迷、欲望低下、日趋麻木的群体画像,在社交媒体中交织成散发着绝望特质的“丧文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步入暮年的老年人展现出了蓬勃向上的新气象。这一点从各地热火朝天的广场舞景观可见一斑。与“丧文化”相对应,这种新气象可称之为“燃文化”。截然相反的人生态度源于两代人迥异的生命历程。当代年轻人成长于社会全面转型期,在飞速运转的时代车轮面前,他们需要不断地探索、调整自己的人生定位,“现实生活的压力及其不确定性是构成‘丧’的一种底色……丧文化更似于一种自我否定与无能为力”。^[8]而当代老年人出生于改革开放前,代际价值观体现出较浓的革命文化与政治底色。^[9]在舍小我顾大我、投身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政治氛围中,迎接挑战、战胜困难成为这一代人的主题,独特的生命历程赋予了这一代人无比坚韧的生命意志。

当代青年一代和老年一代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各自特定的代际位置,大相径庭的人生历程使两代人产生了迥异的代际认同和代际意识,由此形成了青年人的“丧文化”和老年人的“燃文化”这两种看似错位实则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文化倾向。如埃尔德(Glen Elder)所言,少儿时期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会

形塑一代人后续一生的生存境遇、行为选择和态度倾向。^[10]与当今青年一代平缓的人生曲线不同,当代老年人的一生跌宕起伏,急遽变迁的代内流动和青少年时代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具备了审视历史的资本和眼光。回首青年时代的生命岁月,他们会感叹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更为珍惜当前物质富足的新生活。面对新技术新事物带给人类的惊喜,他们也会比其他年龄群体产生更为强烈的幸福感。如访谈中一位老人感叹道:“新冠疫情后用手机的次数和时间也比原来多了起来,这让我更多了解了智能手机,并且学到了原来没有学到的技能。原来对手机的认识只是普通的工具,现在了解了这么多才发现高科技果然是不能小瞧,人类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a18)积极的人生态度转化为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在年轻人“葛优瘫”“宅”在家中的时候,老年人借助智能平台找到了新的人生定位。有的老人担负起疫情期间为全家人在团购小程序上抢菜的重任,有的老人在网络中找到了同好群体,培养自己在摄影、烘焙、国画、音乐等方面的兴趣,也有的老人在社区的协助下投身于公益事业,成为社区群里调解邻里纠纷的意见领袖。新技术与智能媒体为老年人打开了通往新生活的大门,重新角色定位使老人找到了维系自己与社会联系的切入点,在满足社会期待的过程中获得了情感能量,这是保障老年人积极社会参与的持续性动力。

三、“代效应”与智媒时代老年群体社会参与路径

社会参与能够为老年人重新分配社会角色,通过展现自我的方式,使老年人重新走入社会,形成新型社会分工,减少因为“角色转换”而造成的心理落差。^[11]老年人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社会角色以及社会身份的转变,但他们仍存在着属于他们这一世代人群所特有的价值观、态度、规范和习惯。按照分析结果,将智媒时代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领域划分为经济参与、政治参与、文化参与和志愿活动参与几个方面。

(一)经济参与: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老年人

在智能媒体可供条件下,经济参与成为老年人最主要的社会参与方式之一。经济参与主要包括生产参与和消费参与两种形式,其中生产参与以继续

劳动或进行再就业为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返聘和社区再就业,具有较高媒介素养的老年人开始接纳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自我表达形式,并将其服务于现实中的工作与生活需要。“我自己做一点餐饮方面的小生意,有时会在抖音上直播制作过程。现在在当地算小有名气了。”(a02)“我退休以后接受了学校的返聘继续当教授,现在经常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还可以定期举办线上论坛进行学术交流。我觉得这样对学生们是非常有益的,我开展工作也更方便。”(a05)

需要格外关注的是,部分老年人的线上生产方式逐渐转向了“情感劳动”,产生了一批兼具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银发意见领袖或曰“银发网红”群体,如“吃货奶奶”、“济公”游本昌等。“情感劳动”的概念由美国情感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提出,她提出:“如果情绪工作和情绪管理是为了工资,那么就应称其为‘情感劳动’。”^[12]老年人在通过“情感劳动”减少孤独感、实现社会融入需求并获得再次介入社会的情感满足的同时,也引发了“孝文化”背景下的情感支持性消费。即具有共情心理的老年人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支持,从而在同等条件下获得更加丰厚的市场回报,形成由情感驱动的消费关系。老年人以情感劳动为代表的线上经济参与方式正在获得社会的认同。

消费者身份是老年人在经济参与领域的另一重要身份。在被问及“智能产品对日常生活有哪些改变”时,有56位老年受访对象提到了智能手机对购物方式的改变。虽然部分受访对象仍存在对其安全性的担忧,但大多数受访对象还是肯定了线上消费带来的优惠和便利。由于这一代老年人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那些价格偏低且采取社交性促销手段的电商平台更受老年人青睐。“在我们老年人的圈子里其实也有很多流行的东西,比如在‘拼多多’抢红包、拼团之类的,能省钱肯定是一方面,但主要还是和认识的其他老年人能多些沟通和互动吧。之前我们还在拼多多组团答过题,感觉挺有意思的。”(a05)此外,直播间购物成为老年群体网络消费的新形式。“直播间对商品有更详细的介绍”“比较信任和喜欢主播个人”“价格低廉”“商品种类多”是激发老年人直播间购物行为的主要因素。也有部分老年人受直播间营

造的剧情影响而产生购买行为,“前两天我看那个直播,那人说是他工厂破产了没卖完的东西,家里老人还有病没有钱治,我就想帮帮他,东西卖的也便宜,说都是成本卖的,还得秒杀呢”(a12)。大部分老年人的信息分辨能力较弱,对直播间中虚构的剧情难辨真假,难免会在主播引导之下进行非理性消费,受访者中不止一人反馈有过类似购买经历。

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和异质化的特点。银发消费市场蕴含着巨大的潜力,是赋能经济增长的新蓝海。^[13]发挥老年群体在经济参与方面的潜力,有助于将人口老龄化危机转化为“人口红利”,赋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同时,直播间、短视频平台等不规范营销行为也应得到治理,为老年人提供真实友好的网络消费环境。

(二)政治参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薄弱环节

在政治参与领域,智能媒体能够扩展老年人表达诉求的渠道,满足老年人对政务信息的需求。研究发现,老年人虽然对政务信息抱有较为浓厚的兴趣,但相关行为主要集中在利用智能手机进行信息的检索和浏览,鲜有老年人主动进行政治方面的表达与参与。即使个别老人进行过相关活动,参与范围也只局限在社区层面。老年人获取政务信息的主要平台为短视频、微信朋友圈、新闻和微信公众号。其中,短视频的影像传播方式相较于文字更直观易懂,在老年用户群体中成为重要的宣传平台。很多受访者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间,国家政策的变动以及有关疫情信息的更新都是在抖音和快手中看到的。”此外,老年人对政务信息的获取体现出较强的猎奇性。在老年人接收和转发的政治类信息中,带有“绝密”“震惊”“太可怕了”等字眼的惊悚类标题比比皆是。究其根源,在于老年人对当前自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规律的不熟悉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匮乏。

以上现状一方面说明老年人受媒介素养和社会身份限制,在网络上发声参与政治议题讨论的意愿相对较弱。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尚未形成对于政治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意见气候,政务平台的接近权和使用权尚未普及到每一个人,尤其对媒介技术掌握不很熟练的老年用户没有达到完全友好状态。

目前,微政务平台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很多基层政府的微政务平台尚处于信息发布的初级阶段,问政于民的渠道不完善,操作的便捷度仍需改进,这些硬件条件的不健全也极大地削弱了老年群体政治参与的热情。

总之,老年群体在政治领域的参与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说有所缺失,这也是各级政府在微政务平台建设中需要关注和提升的地方。

(三)文化参与:娱乐生活与终身教育

除了经济参与外,文化参与也是智媒时代老年人最主要的社会参与方式之一,主要集中在娱乐和教育两个方面。

首先,娱乐是老年人借助智能媒体进行得最普遍的文化行为。这是因为网络文娱活动参与门槛较低,老年人参与其中时所受的信息素养限制较小。在被问及“除了通信功能外,最常使用智能手机的场景是什么”时,有81%的研究对象提及了他们使用智能产品所进行的娱乐活动。在众多应用中,快手、抖音等带有评论功能的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是老年人进行娱乐活动的首选。“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看小猫小狗的视频,看看新闻,听听‘喜马拉雅’,有时也会看一些旅游视频调节一下心情。”(a03)部分受访者会选择观看熟人发布的短视频内容,给对方点赞或是评论,娱乐活动和社交活动相结合,延伸了老年群体在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网络。此外,少部分老年人逐渐不满足于单纯的观看行为,开始转向信息的表达与分享,如通过发布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个人生活。“开始只是喜欢看,后来一想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账号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呢,那样多有趣啊。但是现在还是有些不太熟练。”(a15)也有部分老年人热衷于在朋友圈发自拍、爱宠、花草风景等照片,通过“展示”行为获得好友的点赞和评论,既使人际关系得以维系,也成为老年人获得自我认同的新方式。新媒体技术扩展了老年人的娱乐方式,智能媒体成为表达情感诉求、促进社会交往的新工具,满足了他们调节情绪、社交互动的需求。

此外,一些自我完善意识较强的老人借助智能媒体进行文化素养提升。在研究过程中,有18位老年受访对象提及了他们的线上教育诉求。对教育的

需求是老年群体在智媒时代自我实现需求不断增加、文化参与意愿不断增强的重要表现。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的目标,提出教育干预是帮助老年人有意义地参与生活和积极享受生活的有效途径。终身教育理论将退休后的继续社会化教育视为受教育的关键时期,在教育的宽度和深度上体现了极强的包容性,是对教育公益性以及普及性重要探索的结果。目前,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能继续发展兴趣爱好,很多网络平台开设老年大学班,老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和专业老师学习国画、音乐、插花、茶道、摄影等课程,并有组织者带领大家定期进行线下交流活动。这样的活动可谓一举多得,既让老人愉快度过了闲暇时光,又提升了审美趣味,同时还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拓展自己的社交网络。

(四)志愿活动参与:自我价值提升下的互助和助他行为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需求被视为最高层次的需求。老年人退出主流社会圈层后,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减少,往往会因对角色的期望无法实现而产生心理落差,从而更加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生命已经增加了岁月,现在我们必须给岁月以生命。”指的就是在延长人的生理性生命的同时,要赋予生命时间以价值和意义。承担一定的社会工作有利于老年群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助于老年人顺利度过暮年时期角色丧失与中断的危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通过参与社会志愿活动寻求价值性需要,即老有所为、老有所用,持续性发挥和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社区是引导老年人进行志愿活动参与最为直接的平台。社区工作人员在访谈中谈到,近年来“银发志愿者”不断涌现。他们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代内“互助”方面。由于拥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和较为相似的社会背景,老年人之间的沟通往往更为通畅。“我受过别人的不少帮助,我也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些上了年纪的人难免存在着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我和他们年龄相仿,互相沟通也方便些,我也更能理解他们在想什么,多少可以安抚他们的情绪、解决问题。”(a13)老年群体内部的互助也被社会广为提倡和

支持,社区工作人员肯定了老年志愿者互助行为的有效性,“他们思想观念上更容易达成一致,这样相互有个照应,困难也好解决。”(c01)此外,老年人拥有丰富的阅历,也可以在“助小”方面做出贡献。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代沟》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喻文化”,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用以概况三种不同的文化传承模式。^[14]虽然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学者们多将讨论重点放在后喻文化,即年长者向年轻人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社会发展,但不能否认前喻文化仍然是文化传承的主导模式。正如米德所言,“代沟”虽然导致代际差异,但并不一定必然带来代际冲突。^[15]老一辈人的言传身教对于年轻一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很多老年志愿者是他们工作上的重要助力者,“有一些叔叔阿姨非常的热心,而且比较有威信,主动提出作社区的沟通员和志愿者,帮助调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这减轻了很多压力,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他们。”(c01)老年人也可借助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将服务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如普及军事知识的“局座召忠”、引发国学文化热潮的戴建业教授、在青年中提倡自律健身的“最帅爷爷”张双利等。他们或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传播知识,或结合自身阅历分享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为年轻人解疑释惑、提供人生指导,赢得了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总之,老年人拥有其他年龄群体所不具备的经验和资历,是优质的社会人力资源,可以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新的价值。如老年社会发展理论指出的那样,老年人要在参与社会发展、贡献自身力量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升华。目前,在智能媒体技术的加持下,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已经显著增强,正在实现由相对弱势身份向社会支持提供者身份的转变。

四、代际差异视角下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提升对策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除了主观的个人期待与意愿,还需要社会各方支持力量的共同推动。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个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相应的心理依靠与物质条件和资源,在适老型社会的建设中应形成社会合力,实现对老年群体的赋权增能,推动社会

运行模式向适应老年群体生存及发展的方向转型。

(一)建立适配的信息“硬环境”与“软环境”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原动力”在于亲老化、适老化社会体系的建构,从根本上提升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生活舒适度和心理满意度。一方面,要在“硬环境”上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基础设施和便利条件。从“互联网+养老”的角度出发,服务老年人的真实需求,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设计包容老年群体的社交平台,实现“精准关爱”,为老年人定向提供养生、医疗、娱乐以及养老等方面的服务。另一方面,要在“软环境”上配合建立有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制度和机制,减少老年群体的技术恐惧,提升老年群体的“技术自我效能感”,从而推动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无障碍化建设。

“积极老龄化”理念认同并保障老年人的社会融入权利,鼓励老年群体的优势发挥与价值创造。尽管目前我国社会依然在延续以年轻化为导向的利益分配格局,但老年人的利益和福祉已获得关注与重视。社会正在全力实现价值之维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提高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的生活舒适度和满意度,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纳入数字包容性社会的建设中。

(二)营造“心理社区感”,加强代内联系

社区是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联的社会单元。营造心理社区感有助于加强老年群体代内联系,是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关键因素。心理社区感就是觉知与他人的相似性及与他人的互相依存关系,帮助有需要的人,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16]传统的社区自组织结构往往较为松散,以休闲娱乐性质为主。在积极老龄化的背景下,社区建设要实现“老有所乐”向“老有所为”的转型升级。智能产品增强了老年人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除了线上互动外,线上组织、线下互动的模式在老年人的社区活动中也较为常见。“之前偶尔会去去社区的活动室,现在感觉社区组织的活动越来越丰富了。建了微信群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也更方便了。”(a09)社区工作人员也表示:“我们现在也在不断丰富社区活动的形式,我平时也看些叔叔阿姨们发的朋友圈和小视频,看到有好的素材会收集起来。我们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上

的文艺活动、棋牌类游戏,让社区的老年人互相熟悉起来。”(c02)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群体动力学理论指出,学习者之间的有效交互能够产生深入发展的持续动力,是集体智慧产生的根本原因。具有较好经济条件和较高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一般会较早地接触智能产品,这部分老年人正是勒温所说的“群体领袖”。他们的媒介接触和社会参与行为会激发群体中其他老年人的使用意愿,增强群体认同感与情感共鸣。

(三)增强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

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元,与个人联系最为密切,也最容易影响老年群体的心理和社会行为。研究发现:来自于年轻家庭成员的“数字反哺”和引导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老年人的技术焦虑和技术怀疑,并增加了他们的智能媒体使用强度和社会参与意愿。在遇到“数字困难”时,家庭成员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求助对象。在被问及“在学习使用智能产品时受到过怎样的帮助”,21位老年受访对象中有15位提到了家庭成员的帮助。“儿子给我买了5G手机,教了我怎么网购,怎么看新闻。还让我多发发朋友圈,多和其他老年人互动一下。”(a11)

目前,家庭已经成为短视频领域一支强大的内容生产力量。在家庭类短视频中,家庭所有成员都是作品生产主体,视频内容以反映家庭日常生活为主。在“慢直播”式的录摄过程中,生活中的点滴细节被镜头放大,每个人都比以往更为关注身边的家人。全家人分工协作,有了更多的可以交流的话题,冲散了代际间的隔阂与冲突。来自家庭成员的数字反哺不但可以解决老年人在智能产品使用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还可以弥补老年人因对技术的不确定性把握而产生的数字获得感缺失。

(四)打破代际禁锢,肯定社会价值

如角色期待理论所言,观念的转变首先应体现在个体对自身角色期望的转变上。当代老年人要能打破代际禁锢,充分认识自我价值,不断完善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秉持终身发展和终身学习理念。“我现在跟以往的观念不同了。以前觉得退休了没什么事做了,自己也没什么价值了,现

在我觉得自己仍然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充实,仍然可以继续学习,展示自己。”(a16)

在社会观念的转变层面,要在全社会形成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现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共识。“我们的父母也在学习适应这些新技术,我们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和相应的指导。”(b01)“作为社区工作者,我们处在关怀帮助老年群体的重要位置,我们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老年人提供充分的技术指导和鼓励,让他们有被认可被支持的感觉。”(c04)如上述访谈者所言,要正视老年群体社会价值,打破对老年群体的刻板成见,接受其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意愿并给予充分的尊重、鼓励和引导。

五、结语

在数字化与老龄化并存的时代,引导并支持老年人进行积极的社会参与,对促进老年群体自我价值实现、减少社会脱节与角色落差、加强社会凝聚力具有关键作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是老年人与社会保持良性互动、实现价值再社会化的过程。数量庞大且极具生产和消费潜力的老年人,是不可忽视的“新蓝海”。研究智媒时代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有助于在数字时代深化积极老龄化思想,进一步弥合数字鸿沟。

老年群体是效率导向型社会建设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之一。技术嵌入本身就具有一定强制性,导致目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仍存在参与领域有限、参与被动等问题。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能以牺牲老年人的利益为代价,要基于新技术改善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环境,加大对老年群体的圈层认同,减少基于代际不平等的“数字歧视”,使其获得充分的“数字公平感”,增强社会整合度。

参考文献:

[1]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M].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3:41-42.

[2]范玉吉,李紫繁.从赋权到限权: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研究[J].未来传播,2021(5):29-37.

[3]Mannheim, K.(1952).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4]蒋俏蕾,刘入豪,邱乾.技术赋权下老年人媒介生活的新特征——以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为例[J].新闻与写作,2021(3):5-13.

[5]李宗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基础及路径选择[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92-93.

[6]Pilcher, J.(1994).Mannheim's sociology of generations: An undervalued legac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5(3): 481-495.

[7][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美]詹姆斯·富勒.大连接[M].简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3.

[8]王学琛.代际差异与青年人情感情结构转型:对“丧文化”的质性研究[J].热风学术,2018(4):87.

[9]廖小平.社会转型与代际价值观的变迁[J].河南社会科学,2006(4):22-26.

[10]Elder, G.(1974).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李宗华.近30年来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的综述[J].东岳论丛,2009(8):60-64.

[12]韩敏,孙可欣.数字情感劳动:老年人再社会化[J].青年记者,2022(6):59-61.

[13]方提,黄莉婷.“银发网红”的媒介话语建构及其社会根源[J].新闻爱好者,2022(2):35-39.

[14]Mead, M.(1970).Culture and commitment—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15][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的研究[M].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87.

[16]王薇.社区感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宁波开放大学学报,2022(1):10-14+19.